
天府之国丝绸起源与发展的文化解读

谭继和¹ 刘平中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71)

【摘要】天府丝绸有其独特的历史始源，特殊的形成过程与发展历程，蕴含着不断吐故纳新的强大生命活力与文化活态基因。天府丝绸发展，具有自身的文化特点：远古多地起源、同步发展的特征；秦汉代天府之国的重要经济支撑；唐宋丝绸之路的重要源头；明清“丝绸之都”的销解。

【关键词】天府；丝绸；解读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7)05-0021-6

一、天府丝绸的远古起源

黄帝时代，有“垂裳而治”的传说。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黄帝娶西陵氏之女嫫祖为妻，嫫祖发明养蚕织丝之法，教民育蚕治丝，制作丝织的服饰。黄帝“垂裳而治”天下，一方面表明，正是他教化民众穿丝绸衣服，遵守礼仪教化，才使原始人类朝着文明发展的方向进步；另一方面，说明我国是世界上很早开始养蚕缫丝和织绸的国家。

黄帝与嫫祖有子名昌意。后昌意降居于（四川境内）的若水。昌意娶蜀山氏之女而生高阳，高阳即颛顼。颛顼后来继承了帝位。作为远古时代的历史传说，其历史的真实性的确需要进一步的考证，但它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黄帝部落与蜀山氏部落联姻的事实。嫫祖养蚕、缫丝和制衣的技术随着部落联姻，被传播到蜀山氏居住的岷江流域的原始部落。这是传说时代关于天府丝绸起源的文化历史。换句话说，天府丝绸的文化起源，至迟在上古的颛顼时代已有一定的存在。

在古蜀历史上，曾相继出现了蚕丛、柏灌、鱼凫、鳖灵和开明五个时代。“蚕四，的字面意思，就是蚕聚集成团成堆之意。蚕，最初仅是原始民族的一种食品，后来人们发现蚕丝可以制作绳索、网具等生产和生活根据，这是对蚕的另一种功能的重大发现和利用。嫫祖子孙娶蜀山氏之女的部落联姻方式，在促进部落间的交流外，主要是把嫫祖养蚕制衣的技术传播到了蜀地的蚕丛部落。岷江流域的蚕丛氏，也就成为蜀地原始部落中第一个养殖蚕和蚕蛹的部落。此外，从字源学的角度看，“蜀”字的象形最早就是一条“蚕”的形状，说明蜀地与蚕的确在远古存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历史联系。从采集蚕作为主要食品到学会用野蚕丝、柞蚕丝制作生产工具与衣服，扩大了蚕丝在氏族部落生产生活中的作用，这是蚕丛时代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大贡献。

考古学上丝绸发现的起源。根据三星堆考古发现可以推测，这一时代大致相当于古蜀历史上的柏灌、鱼凫时代。从三星堆青铜立人所穿的外衣的纹饰、形状可以判定，它不是兽皮也不是麻或者草制作的衣服，而是丝绸锦绣制品。它的存在雄辩地说明这一时期蜀地养蚕制衣的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属于丝绸技术趋向成熟的时代。杜宇开明时代，大致相当于从金沙到战国时代。这一时期的丝绸已经有了更大、更为广泛的用处，丝绸的生产与技艺也有较大的进步。这从十二桥船棺葬中发现的丝绸服饰可见一斑。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传说时代与考古时代天府丝绸文化的主要看法。

¹作者简介：谭继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平中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关于丝绸以及天府丝绸的起源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进一步的探讨和思考。

一是丝绸的起源，是与人类文明的起源同步的。在新石器时代，人们穿树皮、草绳、兽皮衣服，最多不过穿麻织衣服。这就是原始时代的所谓“衣服”的概念。从兽皮、麻衣到丝绸制作的衣服，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从考古发现的证据可以证明，人类在原始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经发明和利用丝绸制品了。可以说，丝绸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象征与标志。人们制作和穿着丝绸的衣服，不仅有了礼仪之感，懂得了羞耻之心，而且已经具备了初步的审美需求与文明心理。

二是蜀中历史上的丝绸，起源于缣。最早的蜀中先民，通过在砧板上捶打野生蚕丝、家养蚕丝等方法，制作了生产生活所需要的缣制品。在掌握制作利用缣的基础上，人们开始制作工艺水平较高与使用范围更广的锦，后来又学会了用丝线在锦上刺绣的技艺，并以丝线刺绣制作锦绣。从三星堆考古发现的青铜立人的衣服纹饰、图案可以证明，此时人们制作锦绣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

天府丝绸来源于缣，这是天府丝绸起源的一大特点。人们先学会制作缣然后再制作锦，并在灌锦江中洗涤。以江水灌洗后晾晒的锦色彩特别鲜明，以至蜀锦闻名天下，此后遂有灌锦江优于他水之说。这是天府丝绸的又一重要特点。

以上是我们关于天府丝绸由缣而锦，再发展成为锦绣的大概历程与情况的主要认识。

三是丝绸作为文明的象征，如文明的产生一样也是满天星斗式的，是多地、多元同时起源、同步发展的。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很多地域文化中，都同时出现了有关丝绸起源的传说这一又去形象。正是对这山认识的有力证明。与巴蜀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天府之地也是中华丝绸文明的重要起源地。

四是现在发现的考古证据可以证明，丝绸文明具有多地起源的理论特征。如巴蜀文化、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等，几乎都是在距今 6000 年左右同时产生的。在江浙、新疆等地有关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中，分别发现了距今约 6000 年、7000 年或者 8000 年前的丝绸，这恰好证明不同地域文化中有关丝绸的起源有不同的独立始源，同时也有不同的特点。

天府丝绸文明经历了先有缣然后有锦，然后在锦上刺绣，最后由锦绣发展到现代意义丝绸的漫长过程。这就是“蜀锦出绣”与众不同的独特发展演变历程。

在天府丝绸文化中，一直有大量关于嫫祖出生在四川境内盐亭的传说。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文化现象。丝绸行业供奉的行业神，一般是丝绸最早的发明者。嫫祖作为传说中养蚕制丝的鼻祖，追溯嫫祖为行业祖神是比较自然的事情。实际上，很多丝绸业发达的地方，都有关于嫫祖出生地的传说或在当地发明丝绸的传说。这都是后代丝绸业发达地区在供奉嫫祖为祖神后，自我附会的关于嫫祖的传说以及关于嫫祖的神话。其中，主要包括青衣神与嫫祖结合、嫫祖西陵氏在四川盐亭，等等。这实际上是纪念、尊奉嫫祖的一种传说文化的四川存在而已。

盐亭作为历史上丝绸行业重要的繁盛之地与中心，兴起嫫祖文化传说不足为怪，但就此认为嫫祖为历史上的盐亭人，则需要持谨慎与科学的态度，如有关嫫祖姓王名凤、生于盐亭等传说，显然是民间习俗与民间文化传统的现实表现。实际上，无论是关于嫫祖之名或是嫫祖的姓，都不可能是原始时代人的真实名字，因为她与皇帝所处的时代根本没有这样命名的可能。这些关于嫫祖名或者姓氏之说，显然是历史时代出现后人的名字。这从另外的角度证明，有关嫫祖姓氏的说法的确是后来行业发展后才产生的文化传说，是后世行业文化附会的结果。仔细考察，上述关于嫫祖的文化传说，不只盐亭才有，而是在栽桑养蚕或丝绸业发达的地方都有相类似的传说。仅四川而言，间中、西昌、宜宾、乐山等地，均可以见到供奉嫫祖的习俗或关于嫫祖出生地的传说。不过，盐亭、南充长期以来把嫫祖作为丝绸行业的鼻祖或者祖神的进行供奉，说明盐亭、南充等地在历史上是丝绸行业比较发达的地方。

有关嫫祖出生盐亭的传说，是作为文化史真实的文化，是人们对丝绸祖神文化信仰的一种反映。所以，今天把嫫祖文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传承，尊重嫫祖及其文化传说，是可行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和历史事件的真实本身，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因为，不仅在四川有关于嫫祖养蚕制衣的传说，在江苏、河南等地也有相似的传说。如在苏州，嫫祖还被说成是一位苏州姑娘，同样流传着大量关于嫫祖出生地或发明丝绸的传说与故事。

关于嫫祖出生地的西陵氏，在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均有这样那样的文化传说，这正好说明丝绸文化多元兴起、多地起源的理论是正确的。丝绸文化多地起源是与中华文明的多地起源、多元一体从历史上说是一致的，是同一文明形象的不同表现形式。正像我们在追溯文明始祖时，都以黄帝作为标志一样。丝绸文明把嫫祖作为始祖或者鼻祖，实际上是把她作为某种文化标志在看待。所以，全国各地都在供奉嫫祖，都把她当作本地丝绸业起源的祖神。这种丝绸祖神信仰与丝绸起源的传说，是我们民族共同的、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祖先的历史记忆关于丝绸纺织技术的经验、知识、智慧的现实传承，最后以文化的形式累积到嫫祖身上的结果而已。

因此，我们有关于嫫祖出生地的文化传说，没有必要就此排斥其他地方也有关于嫫祖出生地的文化传说。我们可以开发利用嫫祖文化资源，并不等于说其他地方就不可以开发、利用嫫祖文化资源。从根本上说，都是对于丝绸文脉的传承、丝绸活态文化基因的利用。所以说，这才是我们真实的丝绸文化史，虽然它不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但的确是真实的历史。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丝绸文明的源起问题，必须特别重视的一点是—多元一体的文化起源观。就此而言，南充宣称自己是丝绸的起源地，成都也可以宣称自己是丝绸的起源地。从丝绸文化的传承与利用而言，二者是并行不悖的，是可以自行发掘与利用的。

由原始兽皮、树叶衣演变为黄帝的“垂裳而治”，是一个较长的文明生长时代。这一时期几乎涵盖整个新石器时代早期，即从公元前八千年到五千年的一万多年的时间。在整个人类文明产生的时代，都可以说是丝绸文化转变成丝绸文明的时代。这正是成都乃丝绸发源地之说的文化基础与历史基础。我们说，成都是丝绸的起源地，是丝绸文明的故乡，正是以人类多元文明起源理论为基础的。

二、汉代蜀锦的繁盛

蜀锦和蜀绣的结合，最早出现在汉代，是天府丝绸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与不朽的成果之一。考古证据证明了西汉时期蜀中丝绸发达的事实。

2012年，成都天回镇老官山的一座西汉墓地中，出土了四部竹木质地的织机模型。这是我国首次发现完整的西汉时期蜀锦织机的模型。这四部织机模型，正是提花机的原型，是天府丝绸文明的典型标志物。与四部织机同时出土的，还有16具刺绣的木偶与纺织工人的模型。提花织机机械与刺绣工、织机工的同时出现，说明西汉时成都蜀锦的制作已有明确的分工，规模已经发展到手工工场的初级阶段。这些织机的发现，雄辩地证实了成都就是丝绸之路的南方起点与产品生产地的历史事实。

汉代时，蜀锦的制作水平相当高。其生产、销售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已有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如“锦官城”“锦城”“锦里”这些成都的别称，都是因为成都出产蜀锦而得名。这些别称，都是从两汉三国时代开始的。如晋常璩《华阳国志》云：“始，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其道西城，故锦官也。”^[1]东晋李膺《益州记》也说：“锦城在益州南，笮桥东，流江南岸，昔蜀时故锦官处也，号锦里，城墉犹在。”^[2]都充分证实了两汉三国成都制锦业发达的事实。

在汉晋的古人辞赋中，不乏有关蜀锦制造交易的繁盛情况，反映了两汉成都织锦业曾经的不朽成就与辉煌。如《西京杂记》在论及司马相如词赋创作技巧时云：“词赋者，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3]正是司马相如借助织锦之法，织锦之心，构思与写作大赋的。用织蜀锦的方法形象地形容写作的技法，表明西汉时，织锦业和织锦的

方法已经成为社会文化生活普遍的形象。扬雄在《蜀都赋》中云：“尔乃其人，自造奇锦。……发文扬彩，传代无穷。”^[4]则反映了当时成都织锦的优美与奇巧。《蜀书·诸葛亮传》云：“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5]说明诸葛亮治蜀，已经把养蚕织锦视作富国强兵、支撑北伐中原的重要经济支柱。三国时蜀人谯周《益州志》说：“织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6]说明此时的成都城中，织锦技术和漂洗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亦载：“其道西城故锦官也，锦江织工濯其中则鲜明，濯他江则不如。”^[7]说明用成都南河水濯洗出的蜀锦，具有比其他江水濯洗更加艳丽，品质也更加优良。

西晋文学家左思在《蜀都赋》中颇为细致地记载了巴蜀的物产、山川、风俗情况。他在《蜀都赋》中特别描绘了成都养蚕织锦的繁盛情形。他说：“栋宇相望，桑梓接连。……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赢金所过。”^[8]描绘了当时成都栽桑养蚕，千家万户，机杼之声相和，织锦、濯锦和贩运蜀锦的繁荣景象。

以上辞赋中有关蜀锦生产、制作和销售的记载，表明天府蜀锦不仅有独特的制作技术，特殊的濯洗水源，而且一度被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充分证明从两汉三国到两晋之际，天府丝绸锦绣制作技术已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的事实。

伴随着漆器的对外流通，天府丝绸作为重要的商品远销到蒙古、朝鲜、中亚和西亚等许多域外国家和地区。1995年，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的一座东汉末至魏晋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件刺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一件刺有“五星出东方，讨南疆”的文字锦帛。该锦帛织有星纹、云气纹以及孔雀、仙鹤、辟邪、虎等瑞禽兽纹，具有明显的汉文化特征。该锦帛色泽鲜艳，组织结构繁褥，织样诡秘神奇，被证实是蜀锦中的上等佳品。在蜀锦上绣文字、山河与鸟兽图案，证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在绣缎上刺绣的高超技艺，蜀锦与蜀绣同时存在，并已经有了很好的结合。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块锦帛，本是作为射箭护臂所用之物，但从今人的视角看，却蕴含了丰富的商贸、历史信息与文化信息：一是表明蜀锦在丝绸之路上很早就成为交易、经贸的重要商品；二是表明成都很早就加入了北方丝绸之路，而且与北方丝绸之路重镇长安一样，都是全国商业经贸网络的中心。以蜀锦蜀绣为代表的成都，已经成为了全国重要的丝绸中心，是名副其实的丝绸产地；三是有关“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文字图案，还蕴含了非常重要的文化信息。如《史记·天官书》云：“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利中国。”^[9]这在《汉书》《晋书》《隋书》中亦有相似的记载。所谓“五星”一般学者认为是岁星、荧惑、镇星、太白和辰星等五星。按照儒生们的解释，如果五星同时出现在东方天空中，则对中原王朝对外用兵非常有利。在蜀锦上刺绣反映这一思想的文字，说明蜀锦很早就承担了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即把关于大一统中国、中华正统观、以中原文化为凝聚向心力的中心等思想，以及各地都向中原凝心聚力等文化意识向外传播出去。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巴蜀文明很早就向往中原文化核心这一事实。这段蜀锦的发现，就是最好不过的历史证明。通过蜀锦把中华文化大一统的思想传播到西域、传播到海外，还从一定程度证明了成都很早就把中华大一统思想的核心——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思想在向外积极传播。这是巴蜀文化很早就有的重要的历史传统。这块锦绣的发现，有利于我们今天讲好丝绸之路的故事、讲好蜀锦的故事。

此外，作为东汉晚期三国时的物品“五星出东方，讨南羌”锦帛所蕴含的思想而言，还反映了当时历经战乱之苦的人们希望大一统以及反对国家分裂、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思想，以及向往安定统一的愿望。它与“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利中国”锦帛一样，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与精神价值，值得现在的人们借鉴与利用。

三、唐宋天府丝绸锦绣

唐宋之际，成都织锦刺绣产业相当繁盛，号称“扬一益二”。客观上反映了蜀锦作为全国重要的商贸产品的事实。唐宋之际，蜀锦与南京云锦、苏州宋锦、广西壮锦，并称“中国四大名锦”。所谓“锦上添花”“繁花似锦”等成语，正源于此。唐代的蜀锦蜀绣虽然现存实物不多，但从时人的诗文中不难发现有关蜀锦生产、制作和经贸的盛况。如杜甫有诗云：“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等。刘禹锡在《浪淘沙》之五云：“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匹晚霞。”前半首写锦江春色美景，后半首写女郎濯锦情形，盛赞蜀锦生产之繁华景象与洗涤技艺之美。唐代蜀锦品质居于全国的领先地位，特别在花式纹样上别出心裁、巧夺天工，计有“单丝碧罗笼裙”“四川十样锦”“蜀锦裙”“蜀

江锦”“落花流水锦”等各色花样。唐代陆龟蒙在《记锦裾》中云：

（侍御史赵郡李君），好事之士也。……乃出古锦裾一条示余。幅长四尺，下广上狭。下阔六寸，上减下三寸半，皆周尺如直。其前则左有鹤二十，势若飞起；率曲折一脰，口衔萆苳口；其右有鸚鵡，耸肩舒尾，数与鹤相等。二禽大小不类，而隔以花卉，均布无余地。界道四向，五色间杂，道上累累细点缀：……^[10]

从纹样绣制、图案布局以及色彩的灵活运用，可见唐代蜀锦的制作技术之高超。

在唐代蜀锦中，“陵阳公样”锦绣在图案内容选择、图饰花纹设计方面，堪称蜀锦典范。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介绍益州行台官窦师纶设计制作的蜀锦蜀绣时说：

窦师纶，字希言，纳言陈国公抗之子。初为太宗秦王府谏议，相国录事参军，封陵阳会。性巧绝，……凡创瑞锦宫绫，章彩奇丽，蜀人至今谓之陵阳公样。高祖、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创本师纶，至今传之。^[11]

由窦师纶设计的对雉、斗羊、翔凤、游麟等纹样被称作祥瑞之锦，大大丰富了蜀锦蜀绣的制作技艺。其所设计的图案被后人称为“陵阳公样”，代表了蜀锦蜀绣制作技艺的高超水平。

四、明清“丝绸之都”的销解

有关宋元之际四川锦绣的记载，现在留存至今者较多。如宋代诗人在苏洞在《濯锦江》中说：“机丝波影借光华，巴女临流住几家。争向芳菲偷锦样，织成平白溅江花。”将蜀锦的生产制作的精巧技艺、蜀锦的现状样式、质地美感，描绘多姿多彩、栩栩如生。元人费著在《蜀锦谱》中说：“蜀以锦擅名天下，故城名锦官，江名濯锦。”元以来，随着元蒙战争对四川经济、社会的剧烈破坏，蜀锦蜀绣制作技艺传人的几乎消失殆尽，蜀锦蜀绣制作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在整个元代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急剧下降甚至趋于消失。明代中前期，随着社会的逐步稳定，蜀锦蜀绣产业、商贸又有了一定的恢复与发展。蜀绣与苏绣、粤绣、湘绣同闻名于世，被称作中国“四大名绣”，蜚声中外。蜀绣绣品包括山水、人物、花鸟、虫鱼等题材。其形式、层次、色彩、空间的表现，以至于针法及装饰效果，均有新的创意。特别是“十字绣”技法，充分体现了蜀绣在技巧上继承创新的特点。如双面绣的技法，经过今人的现代化改造，已经绣制出了双面绣的熊猫。其中，同形与异形的熊猫绣，图案优美、熊猫神态悠闲、活泼，是蜀绣与现代文化艺术巧妙结合取得的重要成果。作为丝绸行业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蜀绣针法与技艺为蜀绣走向境外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蜀绣的现代化发展、高品质发展，开辟了新的局面。但明清时期的蜀绣产品，无论制作技艺、产品质量还是市场占有率，已远不如汉唐时期。特别是随着海上航运业的发达，成都作为丝绸产品源头、输出中心的地位不断下降。成都作为丝绸之都的地位随着明清社会、经济与交通的改变被销解，而丝绸作为成都城市发展重要支柱的历史地位与作用逐渐被崛起的瓷器、茶马交易所代替。

需要指出的是，“丝绸之路”简称丝路，本来是指西汉（前 202 年-8 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因为这条路上主要贩运的商品是中国的丝绸，故得此名。但它广为流传并被世人所接受，则是 1877 年的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 114 年至公元 127 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开始的。但是，“丝绸之路”一词的内涵、价值与意义，远远超出了部分历史学或者考古学者所定义的狭义范围。最显著的一点在于：它的价值与内涵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被赋予了新的意涵，并有新的意义指向与重点。它所特有的开放性、与时俱进的特点，随着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变化，在不断根据现实需要进行丰富或损益。仅就天府四川而言，“丝绸之路”的在农耕文明时代最早的或者说最基本的内涵，不过是指丝绸的生产、交易、制作技艺的产品中心以及运输的主要通道。随着近代天府四川在全国乃至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的地位变化，以及四川对外交流输出与引进路线的变化，天府丝绸的意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所指也有新的对象，或被替代或被减少或被增加的情况都是存在的。如在宋元之后，随着茶马互市的兴起，丝绸作为经济和战略产品的地

位下降，天府丝绸之路的作用、地位也就大不如前、悄然变化；特别是随着元代海上航运运输的兴起，四川作为丝绸之路产品源头、技术研发中心和输出基地的等地位逐渐被弱化。天府丝绸在对外交流中的地位与秦汉时期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作为天府文化对外交流的重要对象和四川发展繁荣的历史贡献者和时代见证者，天府丝绸丰富的活态基因与文化影响力始终在不断延续，随着时代的步伐以崭新的形式不断出现。特别是信息化的今天，天府丝绸之路的价值与意涵正被不断注入新的内容与活的力量，正在被赋予新的经济、文化、交流方面的使命与意义，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参考文献

- [1][7]常璩原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三）·蜀志[M]．巴蜀书社，1984. 227, 226.
- [2]李膺．益州记[A]．徐坚．初学记（卷二十七）[C]．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向新阳等．西京杂记校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91.
- [4]李善．文选注[M]．中华书局，1997. 27.
- [5]李昉等．太平御览·布帛部·锦[M]．中华书局，20003624.
- [6]李善．文选注·蜀都赋
- [7]譙周．益州记[C]．中华书局，1981. 79
- [8]杨慎原著，刘琳等点校．全书艺文志（卷一）[M]．线装书局，2003. 10.
- [9]司马迁．史记（卷二七）天官书第五[M]．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 186.
- [10]陆龟蒙．记锦裾[A]．夏咸淳主编．中国古代文苑精品[C]．东方出版中心，1996. 315.
- [11]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十）[A]．赵丰中国丝绸艺术史[C]．文物出版社，2005. 151.